

黄裳
著



名家读书系列
MINGJIADUSHU

黄裳读书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★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名家读书系列

MINGJIA DUSHU

周明 主编

黄裳读书

黄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裳读书 / 黄裳著; 方未选编. —北京: 中国社
会出版社, 2013. 7

(名家读书系列 / 周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087 - 4486 - 5

I. ①黄… II. ①黄… ②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
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1015 号

黄裳读书



著 者 黄 裳
选 编: 方 未
责任编辑: 牟 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编辑部: (010) 66063028

发行部: (010) 66085300 (010) 66080300

(010) 66083600

邮购部: (010) 66081078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60mm × 220mm 1/16

印 张: 15.25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10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10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 读书生活杂忆

003 / 读书生活杂忆

009 / 读书的回忆

012 / 南京书事

015 / 古书的作伪

019 / 谈善本

023 / 谈禁书

029 / 残本·复本

036 / 书香琐记

039 / 常熟翁家

043 / 四印斋

046 / 读书日记（节选）

第二辑 那些读书的人

061 / 傅增湘

069 / 鲁迅与顾颉刚

- 073 / 关于陈寅恪
077 / 陈寅恪写杂文
080 / 弢翁纪念
084 / 忆俞平伯
095 / 忆郑西谛
099 /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——读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
108 / 吴仓硕小笺
110 / 邓拓的藏画

第三辑 读书随笔

- 115 / 怀素《食鱼帖》
117 / 闲情
121 / 品茶
125 / 中秋随笔
129 / 龙堆杂拾
138 / 龙堆再拾
147 / 四库琐话
162 / 四库余话
173 / 北京诗话——《竹叶庵文集》
176 / 鲁迅诗笺
178 / 读知堂文偶记
186 / 读画录
190 / 读黄永玉画记
196 / 《金瓶梅》及其他
199 / 读《一氓题跋》
205 / 关于“挺经”
208 / 陈圆圆

- 223 / 关于刘瑾
- 226 / 几乎无事的悲剧
- 231 / “山中一半雨”及其他
- 235 / 拟书话三则

第一辑

读书生活杂忆

读书生活杂忆

现在已经很难记起自己最早读的是些什么书了。“读书”似乎也有种种不同情形，有被动的、有的则出于自愿。无论是私塾或学校，在那里读的都是老师指定的课本，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。我是由大伯父（他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）开蒙的，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《字课图说》，这是“看图识字”一类的识字课本，每半页三个字，左图右文，编辑得很好，图画得也好，恐怕比识字卡片的历史还要早得多。识得若干字以后就开始读“四书”。如此说来我最早读的应该是朱熹编辑的孔孟的教条。

父亲是学采矿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他从德国回来时，带回了两大箱德文书，不过这与我没有关系。此外家里的中国书好像就只有《红楼梦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和一部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清末上海点石斋的本子，前面附有精致的插图的。不过除了“聊斋”以外，一律被父亲宣布为“禁书”，不许小孩接触。但禁令收效甚微，我总是有办法一一取出翻看。这总是在父亲上班的时候，坐在面向花园的楼下回廊里，可以放心地阅读。中午父亲回来吃饭，远远就能望见，这时只要随手把书向卷起的帘子里一塞，就平安无事，不露马脚，没有出过一次纰漏。

这样说来，我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《红楼梦》。不过除了插图以外，正文却毫无兴趣。第一次记得读到“贾雨村风尘怀闺秀”就废然而止了。但“封神”就不同，那可有意思得多。土行孙真是值得羡慕的人物，他能一顿脚就从地面钻到地下，而且通行无阻，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去。但即使是土行孙也会碰上指地成钢法，真是值得遗憾的事。我的对“封神”发生兴趣，还因为当时正热心地收集着一种“封神”人物香烟画片。

家里用的是“大联珠”香烟，每包附有一张彩色画片，一起大约有一百张，但收来收去只缺一张女娲。画片总是收不齐，小说也就反复地读下去了。

《聊斋志异》虽然不是“禁书”，但开始读它却在许久以后了。我觉得这是第一部使我获得阅读古文本领的最好的课本。我没有读过《古书疑义举例》《助字辨略》……更不必说高邮王氏的著作。古文的语法、句法，差不多都是从“聊斋”里猜出来的，而且以后读更古些的书困难也不多。当然，再古上去就不行了，还是得请教训诂学家。

在南开中学，英文老师李林先生给我们读一种“直接法”的课本，而不采用流行的“纳氏文法”之类。在教学思想上恐怕就持着同样的意见。学生不必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，只要直接接触作品从而“猜”出语法的规律来。我始终认为这方法是好的，和小儿学语一样，是从观察、实践中摸索出经验来。比先学教条，后付实践的方法好得多，但这也有缺点，如果你走上讲台去作语法分析，就会束手无策，甚至连各种“词”的名称也说不出，陷入一种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”的困境。这就是我对语文学家一直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，但只要不做语文教师，有这缺点也没有多大害处。

这种习惯的养成，对此后读书生活的影响是大的。没有系统的、扎实的基础训练，只是碰到什么就读什么，随意吸取营养（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毒素），这是走向“杂家”而不是培养专家的道路。

抗战开始，我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中考进了交通大学。为什么要考交大，动机自然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工业救国的思想。交大是重点大学，按我的数理成绩本是考不取的，但意外地沾了熟读“聊斋”的光，国文试卷中有一段无头无尾、无标点像“天书”一样的古文，给我读通、点断了。而当时唐文治先生正是交大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，他主张语文一科不及格的不得录取；相反，其他各科差一点却可以原谅。入学以后在大课堂中听过唐老先生讲授过半年古文，看他由人扶着走上讲坛的情景使我肃然，因为那时他不但已是高龄，而且失明已久了。但他讲的古文却一句也

听不进，记不住，至今想起还感到负疚。当时交大借了震旦大学上课，学校有一座漂亮的图书馆。我常常从这里借书来看，“四部丛刊”差不多大半都借来看过，当然并未每部仔细阅读，有的只是摩挲一下就归还了。但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了大量版本的样本，懂得了什么是黄跋、何校。记得还曾借阅过《王国维先生遗书》，当然读不懂，但有些是可以懂并喜欢的，就大段地抄了下来。现在手边还保留着当年抄下的一篇《清真先生遗事》。当然，对周美成发生兴趣，还是先读了俞平伯先生《清真词释》的关系。

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，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。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。鲁迅、冰心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郁达夫……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。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。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的插着新书，后来还引起了舍监的注意，被暗中检查并在校务会议上提出。买来的书不一定本本看过，即使看也不是从头到尾地通读。这毛病至今也依旧改不掉。我曾看到过吴翌凤的一方藏书印“枚庵流览所及”，觉得很满意，后来请王福厂照样刻了一方。我想我的买书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形，不过是买了来，翻一过，读读序跋，知道大致是怎样一本书，讲了些什么事情，就放回书架上了，真是名符其实的“浏览”。至于自己喜欢的，不只通读，有些篇多少次地反复诵读过的，也不是没有。鲁迅的《朝花夕拾》和《且介亭杂文》就读过不知道多少遍，不知怎的总是读不厌。

“七七”以后不久，陆续收集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。但我并不灰心，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，而且升了级搜罗起“古本”来，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。《小说月报》也搜齐了从沈雁冰接手改版直至终刊的全份。在三十年代后期，注意收集新文学史料的风气还没有兴起，只有阿英是例外。他的影响是大的，他的《夜航集》和《小说闲谈》……都不只是我的爱读书还是收书的指南。

投稿活动也从这时开始。对象是“孤岛”上《文汇报》的副刊《世纪风》，习作是小小的散文和“掌篇小说”，也就是目前流行的“微型小说”

那样的东西，创作的最初动机是模仿，我想这和小孩子的喜欢学大人说话行事很相近。当时十分佩服、喜欢的散文作者是何其芳和他的《画梦录》，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流派与新的风格，和朱自清、周作人都不同，于是就努力模仿，不过终于学不像。还学过鲁迅先生的《马上日记》，结果当然是画虎不成。学识、眼光如此浅薄而幼稚，是学不成那样的风格与写法的。在外国作家中，则最佩服夏目漱石，特别是他的杰作《哥儿》。反复读了以后真是爱不释手，忍不住要来模仿一下。素材取自来上海后的一年中学生生活。不知怎的，“红衬衫”那样的人物好像就在身边活动，闭起眼睛就在面前出现了。少少加以剪裁编织写成一篇中篇小说。离沪之前托朋友卖给了一家书店，后来不知道被怎样处理了。

来到重庆以后生活环境一直变迁无定，买书、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净尽，接触古书的机会也更少了。但书还是读的，至今还留下了颇深刻印象的是下面两种书。

在扬子江畔的九龙坡上，学校图书馆里竟藏有一部“四库珍本”，这是我过去不知道的。这书从不出借，但因遭到水湿，曾摊开在操场上晾晒。随手拾起一本，正是方回的《桐江续集》。方虚谷的《瀛奎律髓》在上海时曾得到过半部康熙刻的残本，读过一遍，很不喜欢，也并不清楚他的身世和言行。偶然遇到他的诗集，很有兴趣。觉得他的诗写得实在不坏。读着“每重九日例凄苦，垂七十年更乱离”这样的句子，面对着长江岸边烟雨凄迷中隐现的黄桷树，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撼。

接着就是一连串漂泊不定的日子。得书极为困难，但积习难忘，只要一册到手，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，也总要翻一下。一个偶然的机，在昆明市上买到了几册《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》的零本，其中收的大半是晚明野史，中间就有纪南明永历在云南、缅甸流亡与结末的故事。三百年后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，重新走过这些地方，真使人感慨万端。这时写下的几篇“杂记”，如在昆明、贵阳所写，就有点近于历史笔记。尽力收罗可以到手的资料（当然收获是很可怜的），并有意识地模仿着鲁迅先生在《病后杂谈》《题未定草》中用过的方法，这样就逐渐疏远了一向遵

循的那条“梦中道路”，逐步接近了现实。虽然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。

离开学校走入社会，给读书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。过去只是读几本小书，现在是开始翻看一本更丰富多彩、无边无岸的大书了；过去的读书是漫无目标的，现在懂得为了工作、学习、写作而确定搜寻与阅读的方向了。

这时候我开始成为一名记者。

对新闻记者的要求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。这恐怕要算作一条规律。记者中间可以有专业的分工，但不论分工如何细致，他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，其次还要求有广泛的知识。记者要接触社会上九流三教各色人物，没有够用的知识是不行的。过去我曾和一位老同行说笑话，判断一个记者是否合格，要看他与被访问者的谈话在一小时内是否露出了“马脚”。举例说，无论遇到国学大师、书画名宿、佛教居士、历史学者……都能谈得入港，使对方觉得你是个在水平线上的“通人”，这样才能引起对手的兴趣，打开他的心扉。不要一落座就掏出笔记本来，最好是始终不用任何记录工具。谈话以闲谈的方式为好，需要了解的问题也最好不是异峰突起似的提出，却融汇在漫谈之中，让对手在自由的谈话中生动、深刻地阐发自己的意见。

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不是容易的事。工作会迫使你抓紧补充所缺乏的常识，就要读书；工作会不断扩展你的视野，如果你是热爱生活的，你的兴趣、爱好也必然随之而扩大。在这基础上的学习、读书，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，效果也必然完全两样。

记者需要同时担负采访与写作两种职能。除了新闻报道、通讯特写之外，还要写时评、短论，并学会出题作文，组织最合宜的作者心情舒畅地写出出色的文字来。

《红楼梦》写薛宝钗挖苦宝玉说，“宝兄弟整日价杂学旁收的”，就是在阐明“杂家”的涵义。这和“四库”分类里的“杂家”并不是一回事。

杂家和专家之间并不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杂家不仅可能化为专家，有时还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，在学术领域中开辟出一种新的流派，在文字上创立一种新的风格。这是更为困难、更不易达到的境界。不过“江

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十年”，杰出的人物总是会出现的。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，而他的影响也不只数十年而已。他不只读的书多，知识广阔，尤重要的他有一双晶明澄澈的眼睛，能透过社会上、书本中纷纭复杂的事物，看出那底细来。他不是“书橱”，更不是“世故老人”。他的本领是从勤奋的学习和勇敢不懈的探索中逐步获得的。

只强调博与杂而忽略了深入的思索，那就只能走向反面，变成浅尝辄止的“半瓶醋”，和思想上的庸人。像《一捧雪》中的汤裱糊，贾府上的单聘仁、山子野，琴棋书画，吹拉弹唱，样样都来得一手，到头来只能是作“清客”的好材料，也即鲁迅所说的“帮闲”，对人民大众没有丝毫好处。这是一条危险的路。年纪一天天大起来，也日益感到这危险的严重。近来常常想，自己到底懂得些什么呢？真能有把握地自信头脑一直是保持着清醒的么？恐怕两种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可疑的。

喜欢买书，但并不本本细看。就像一个人有不少老朋友，但多半素昧平生，事实上就将和没有朋友一样。因而又时时有“悔之晚矣”之感。这当然是大可不必的。朋友总是越多越好，重要的是要努力去熟悉、了解，弄清其长处与缺点，并采取相应的态度。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孙子的这两句话，看来在读书上也是适用的。

一九八四年二月二日

读书的回忆

鲁迅在《朝花夕拾》的小引中说过这样的话，“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了罢。”我一直佩服并奉行着先生的这意见，从来就没有过写回忆录的心思。一方面固然因为还不甘心立即陷入无聊的境地；而过去的状况回忆起来也实在平凡得很，并无值得记下的有趣的经历。可是编者却一定要我写下一点读书的回忆，这就不能不使我感到惶惑。书当然已经读了几十年，经验么却实在并没有。我在大学里读的是工科，但个人兴趣却在文史方面，课余读书也都是随便翻翻式的杂览，并未受过正规的训练。说起来我还应该算是唐文治的学生，大学一年级时听过他老人家的课。课是在大礼堂里上的。他已经失明，由他的儿子搀扶着登上讲坛。他讲课的声音倒是洪亮的，中气充沛，所讲的内容可是早已忘记了。当时学校借用租界里震旦大学的校舍上课。那个图书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好的。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，我借来看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印的“四部丛刊”二三编的另种。说也可笑，我对版本的发生兴趣就是从这种泛览中开始的。那真是随便翻翻，书的内容十之八九没有涉猎，注意的只是黑口白口，雕版风格，藏书印记，和张菊生的跋文。洪北江曾讥讽某些只重赏鉴而不注意内容的读书人为“横通”，我却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这种胡乱翻书的道路，至今也还是如此。横则有之，通则未必，这实在是使人惭愧的。

一九四二年冬来到重庆，九龙坡的校舍里也有图书馆，可是藏书贫弱得很。记得只有一部也是商务印书馆印的“四库珍本”，因为受潮摊在操场上晾晒，随手翻检，找到一部方虚谷的《桐江续集》，读到“每重九日

例凄苦，垂七十年吏乱离”时不禁大为感动。一个年轻学生为什么会为方回的垂老哀吟所震撼，当然是时世乱离所产生的回响了。

抗战中在内地得书不易，后来流寓昆明、桂林更是无书可读。慰情胜无的好像只有开明书店发行的一种《国文月刊》，这里面有些文史论文，可以聊慰饥渴，一些唐诗宋词的名章俊句，读了真有如遇故人之乐。又不知从谁那里借到了几本神州国光社出版的《内乱外患历史丛书》（记得是这个名目，可能不准确），所收都是晚明野史，真的是难得的宝贝书，耽读不倦。在那个火时代，来到昆明桂林这些地方，读着南明永历播迁的野史，不被打劫是不可能的。昆明的华山西路五华山脚下有一块小小的石碣，刻着“永历帝灰骨处”字样。每次走过，免不了总要多看一眼。西门外莲花池畔有陈圆圆的几块石刻画像，上面写着她的小史和在此自沉的纪事。走过时就不能不想起三百年前的旧事，说是“发思古之幽情”固然不错，但这怀古是与伤今结合在一起的，并非一般的附庸风雅也是千真万确的。抗战中住在沦陷了的北平的陈垣为什么要写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那动机也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人们又注意起晚明历史来，那原因就在此。

昆明城里有一个翠湖，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，这是个古色古香有趣的地方。一座小楼，四周是庭院，院子里有树有花，多的是昆明有名的茶花。天空碧蓝碧蓝的，有时候也飘过一朵白云，阳光洒满了庭院，更衬出了这个小院子的幽静。我抽空到这里来过几次，借南明历史书看。那时的眼界不宽，见书更少，凡有所得都觉得异常珍贵，我就用这些抄得的零碎材料写成了《昆明杂记》。后来到了贵阳，也跑过图书馆，写成《贵阳杂记》，记杨龙友的故事，因为他是贵阳人。

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，有空就跑跑旧书店，随意买书。我不想做藏书家，买书也漫无标准，但对南明历史的耽嗜却使我特别留意于此，很收集了一些，但其中无善本，无僻书。眼界是稍稍宽广了一些，知道这一领域实在广阔得很。买得谢刚主的《晚明史籍考》，从中得到摸索的门径；又见到郑振铎印的《玄览堂丛书》，接触到许多秘书佳册。因为编报，与吴

晗相识，读了他写的一些别致的明史论文，像《社会贤达钱牧斋》这样的作品，谈的是旧史，却着眼于现实，非常佩服。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《金陵杂记》与《旧戏新谈》就是有意无意地模仿了这种写法，取材也不限于晚明，凡有可供驱遣的史料，都收拾了来作为素材。至于较系统地进行研究，还没有这样的野心。

郑振铎当时正编辑着大型刊物《文艺复兴》，他的文学史癖又发作了，计划编两期“中国文学研究专号”，要我也投稿凑凑热闹，那时我正读吴梅村诗，就提出要为《鸳湖曲》写一篇笺证。一天晚上，在静安寺庙弄西谛的书斋里闲话，我说起搜集材料的困难，西谛就随手从零乱的书堆里拣出了一部《几社壬申文选》，说从这中间可能找到晚明文社中一些读书人的政论。这书是明崇祯刻本，在我当时看来正是名贵的善本，西谛的慨然相假，不少吝惜，使我非常感动。这部书一直放在我手边，直到解放后重见才还给了原主。远在北平的吴晗知道我在收集晚明党争的史料，寄来了一册《霜猿集校注》。这是孟心史的著作，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铅印线装小册，十分难得。其中有关周延儒和吴昌时的史料极为丰富，给我以很大的帮助。在师友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写成了“笺证”，算是几年来留心晚明史事的一点小小的结束。

解放初期，江南旧家的藏书大量流出，晚明清初的禁书也时有发现。山阴祁氏的藏书中晚明史籍尤多。我所见到的有祁彪佳的疏稿，其中就有参奏吴昌时三疏的原件。彪佳日记中记崇祯末年与周延儒吴昌时的斗争，也都是第一手的材料。又买得泉唐戴氏（熙）藏旧抄花村看行侍者的《谈往》，也是记当时党局朝政的可贵的史料。久想重写《鸳湖曲笺证》，但几次拿起笔来都又重复放下，觉得重写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时移事换，对南明史的兴趣也逐渐淡漠了。